

解释学译丛



〔意〕詹尼·瓦蒂莫 著

现代性的 终结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解释学译丛

现代性的终结

——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

〔意〕 詹尼·瓦蒂莫 著

李建盛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终结/(意)瓦蒂莫著;李建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解释学译丛)

ISBN 978-7-100-10105-9



I. ①瓦... ②李... III. ①阐释学—研究
IV. ①B0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88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解释学译丛

现代性的终结

——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

〔意〕詹尼·瓦蒂莫 著

李建盛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105-9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frac{3}{4}$

定价: 22.00元

Gianni Vattimo

LA FINE DELLA MODERNITÀ

Copyright © 2011 Garzanti Libri s. p. a. Milan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3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Polity 出版社 1988 年英文版译出

解释学译丛序

洪 汉 鼎

千禧年之际,我曾有出版两套丛书的计划,一套是介绍当前国际上关于解释学(或诠释学)研究的优秀著作,另一套是我国国人有关解释学解释的论著。后一套丛书曾以“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名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自 2001 年出版,现已出版了 8 本。前一套丛书由于翻译和版权诸问题,直至今日才得以由商务印书馆问世。

解释学作为一门西方显学,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被引入中国,然而其生命力之旺盛,却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的发展。它本来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因而在我国固有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以致西方解释学与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的结合在我国形成一个学术浪潮。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希望借西方解释学的方法开展对中国思想史的新研究,而许多西方解释学研究者则想借中国经典诠释的漫长传统和经验而得以发展解释学基本理论。但是在这种相互补充的学术进展中也出现了问题:西方解释学概念是否就是指中国经典解释中的解释?显然西方解释学在其早期,即施莱尔马赫及其以前时期,乃是一种如何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的技艺学,但当解释学发展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时期,西方解释学已从早期的方法论转向本体论,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解释学应是一种哲学,而不只是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与我国经学所强调的经典诠释方法,是否完全合符若节,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甚至有人还提出中国解释学这一提法是否合理的问题。

这里我想再次引用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作为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的观点。伽达默尔在 1971 年所写的“答《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曾明确回答了何谓实践哲学和何谓哲学解释学这两个概念,他说实践哲学这一概念尽管是从亚里士多德的 *Phronesis* [实践智慧] 概念而来,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乃是研讨经常变化不定对象的具体操作知识,反之,实践哲学却应是理论性的反思哲学,“因为它所教导的并不是去解释和决定某种具体实践情境的实际操作知识,而是促成关于人的行为及其‘政治’此在形式的‘一般’知识”(《真理与方法》,第 2 卷,德文版,第 253 页)。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应具有理论和实践这两种品性。作为理论,它就不仅仅是一门实践的操作知识,而更应是一种理论科学,但作为实践,这门理论应有具体的经验条件形式。伽达默尔写道:“实践哲学并不像语法学或修辞学作为一种技艺学那样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则知识,毋宁说它是对此类知识的反思,从而最终是‘一般的’和‘理论的’知识。另一方面,学说和讲话在这里处于一种特有的条件之中,因为所有道德哲学的知识以及相应的所有一般国家学说,均与特殊的学习者的经验条件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完全承认,只有当学生已成熟得足以把一般的话语以独立的责任感运用到他们生活经验的具体环境之中,则这种关于每个人最独特的具体实践的‘一般话语’才是正当的。因此,实践的科学虽然也许是一种‘一般的’知识,但这种知识

与其说是制造的知识,倒不如说是一种批判”(同上书,第 253—254 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伽达默尔谈到了哲学解释学,他说:

这就似乎与哲学诠释学相近了。只要人们还把诠释学定义成理解的艺术,并把诸如讲话艺术和写作艺术等这类艺术的运用理解成与能力有关的行为,则这类学科性的知识就能作为有意识的规则运用并可以叫作技艺学。施莱尔马赫和他的后继者就是这样把诠释学理解成“技艺学”。但这却并不是“哲学的”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不会把一种能力提升为规则意识。这种“提升”总是一种非常矛盾的过程,因为规则意识也相反会重又“提升”为“自动的”能力。哲学诠释学则正相反,它是对这种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力基础的知识作的反思。因此,它并不是用于克服特定的理解困难,有如在阅读文本和与别人谈话时所发生的那样,它所从事的工作,正如哈贝马斯所称,乃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知识”。(同上书,第 254 页)

在 1978 年所写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中,伽达默尔再次谈到解释学这种理论品性和实践品性。正如悲剧诗人和音乐家如果只是学会他那门艺术的一般规则和进行方式,而无法用它们写出作品来,就不能算是诗人或音乐家,同样,如果某位医生只掌握医学的知识和治疗规则,但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应用它们,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医生。因为“真正的知识,除了那种是知识的东西以及最终把一切可知或‘整体的本质’所包括在内的东西之外,还要认识 kairos[良机],也就是说,要知道必须在何时讲话以及如何讲话”(同上书,第 307 页)。谁是真正的讲话能手,谁就会

把他要说服人家相信的东西当作善和正确的东西加以认识并对之加以坚持。但这种善的知识和讲话艺术的能力指的都并非普遍的“善”的知识,而是人们此时此地必须用来说服别人相信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行动和面对谁我们这样做的知识。在此伽达默尔谈到,如果我们从近代解释学进展的概观出发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和技术理论传统,那么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感受到的技术知识概念与包容了人类最终目标在内的实践-政治知识概念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地基上将会产生多大的成果。伽达默尔继续说:“就解释学而言,它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那种与现代理论科学概念及其实践-技术运用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与这样一种走着从实践到其理论意义相反道路的知识思想相对照”(同上书,第314页)。

为了深入理解西方哲学解释学这一作为实践哲学的新观念,我从西方诸多解释学研究的资料中选择了这些书,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解释学的新研究。

目 录

英译者导论·····	1
导言·····	53

第一部分 作为命运的虚无主义

1 为虚无主义辩护·····	71
2 人道主义的危机·····	83

第二部分 艺术的真理

3 艺术的死亡或衰退·····	101
4 诗语的破碎·····	115
5 装饰/纪念碑·····	128
6 艺术革命的结构·····	139

第三部分 现代性的终结

7 诠释学与虚无主义·····	161
8 真理与诠释学本体论修辞学·····	179
9 诠释学与人类学·····	194
10 虚无主义与哲学后现代·····	212

文献说明·····	229
索引·····	231

英译者导论

“后现代性”的观念处于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争论的中心。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后现代性的批评家和支持者都经常参与非常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对于绘画、建筑、芭蕾、戏剧、电影、文学和哲学的争论。^① 存在一种广泛的共识,即西方的观看、认识和表现方式近来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是,对于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西方文化正在走向何方,则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现代性确实已经走向了终点呢,还是只发生了一种表面的变化? 信息系统技术的全球扩张,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意味着文化和社会进程的持续性转变呢,还是可以把它解释为现代性自身逻辑的一部分? 倘若我们承认,我们正处于现代性终结的历史的某一点上,就可坦然地认为,困扰现代性的难题可以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弃之不顾吗? 争论中的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而且争论的

^① See, for instance, Charles Jencks, *What is Post-Modernism?*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 Bay Press, 1983);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Jonathan Arac, ed., *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and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结果也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后现代性话语所依赖的概念——即作为现代性文明终结时刻的“现代性的终结”概念——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而细致的分析。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现代性的终结》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力图为
vii 人们理解现代性的结束及其对艺术和科学的深远影响提出一种哲学基础。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但是,从瓦蒂莫观察问题的视角看,这项研究牢固地植根于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的哲学传统,并用他自己的思想洞见深入到我们正艰难把握的人类主体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之中。然而,带着一种对哲学失败的持久意识,瓦蒂莫对这种哲学传统的关注是为了对付当代技术文明所导致的异化状况。正如因现代文明而发生了剧烈变化的自然世界一样,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荒漠”在不断增长,因而这种状况需要一种来自当代思想的肯定性回应。摆在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为哲学在现代性终结之时塑造人类存在的构成性图景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哲学家的评估。

收集在这部书中的论文体现了瓦蒂莫的宽广思想领域以及他的完全国际化的哲学学科的方法。尽管其中的许多论文起初是专门为会议和学术期刊撰写的,但总起来看,这些论文却构成了他过去10多年中前后连贯和精心设计的旨趣和思想。这篇导言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描述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的中心主题,对这种设计做一个初步评价。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向读者阐明瓦蒂莫的基本哲学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否则读者就会发现,这些基本概念难以理解。读者将会碰到的一个特殊困难可能是,《现代性的终结》主要是一部理论性的哲学著作,相对来说作者很少对主要观点做出详尽的解释。尽管瓦蒂莫突出了

其他哲学家和理论家的作用——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丁·海德格尔对后现代性的思考,但是,这里几乎没有提供对他们的文本的全面而详细的解读,他通常只引用单个的格言、语句或段落。在他已出版的论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做过详细的解读,因而,《现代性的终结》一书也就想当然地只考虑了那些熟悉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意大利读者。然而,除散见于专业刊物中的一些文章外,瓦蒂莫的大多数文章仍不为英语世界所知。因此,在本书开头为那些不熟悉瓦蒂莫在本书中论述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读者,而且对他那些经常用简略方式提到的思想,提供一些语境化的信息是合适的。但是,在下面几页里,我却有意避开对瓦蒂莫本人的后现代性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虽然我相信,他的许多观点和解释都是可以质疑的,但是,这里并不是表达我本人的保留意见的地方。

詹尼·瓦蒂莫 1936 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在获得了古典研究的学位之后,他带着缜密的古典研究计划,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在都灵大学师从路易吉·帕勒松(Luigi Pareyson)研究哲学。帕勒松是 40 年代初期较早发现存在主义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尽管法西斯专制下的意大利文化处于一种孤立状态。他在 1940 年出版了《存在哲学与卡尔·雅斯贝斯》,1943 年出版了《存在主义研究》。战争结束后的那些年,是标志着意大利同心协力在法西斯主义灰烬中创造新的、世界性文化的时期,帕勒松致力于把海德格尔的著作和诠释学介绍给意大利哲学界。瓦蒂莫在帕勒松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后,便到西德海德堡大学师从 H. G. 伽达默尔和卡尔·勒维特(他们俩都是 20 年代马堡时期海德格尔的学生)从事哲学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前后,瓦蒂莫的研究重心

转向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欧洲哲学,最重要的是诠释学和本体论,ix 论,自此之后,他便全力投身于这个领域的研究。1963 年,瓦蒂莫以某种传统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存在、历史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后来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海德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尼采的文章,1985 年以《现代性的终结》的书名在意大利出版。^② 1966 年,瓦蒂莫为罗约蒙特的海德格尔学术研讨会提交了备受推崇的论文,因而首次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帕勒松在都灵的教学工作中退休后,瓦蒂莫——曾多年担任帕勒松的助手——作为美学教授接替了他的职位。1982 年以后,瓦蒂莫一直在那里教授理论哲学。像他的许多欧洲同代人一样,瓦蒂莫深受 1968 年学生运动及其事件后果的影响。1974 年,他出版了论尼采的著作《主体与面具》(*Il Soggetto e La Maschera*),这部著作以欢庆“(资产阶级)主体死亡”的语调以及杂糅着马克思和尼采的概念反映了 1968 年运动的主题。在同一时期,瓦蒂莫在都灵激进党的政治中曾扮演过积极的角色,这个党派最小,却是意大利许多左派政党中最直言不讳的。70 年代后期以后,他成为了意大利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微弱的思想”(il pensiero debole)的论述。在整个 80 年代的意大利,瓦蒂莫关

^② Besides *La fine della modernità*, Vattimo has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books in Italy: *Il concetto di fare in Aristotle* (1961); *Essere, Storia, e linguaggio in Heidegger* (1963); *Poesia e ontologia* (1967); *Schleiermacher, filosofo dell' interpretazione* (1968); *Introduzione a Heidegger* (1971); *Il soggetto e la maschera* (1974); *Le avventure della differenza* (1980); *Al di là del soggetto: Nietzsche, Heidegger, e l'ermeneutica* (1981); *Introduzione a Nietzsche* (1985). He also translated Hans-Georg Gadamer's *Wahrheit und Methode* into Italian (*Verità e metodo*, 1972). In addition, he has edited and co-edited many other books, and has produced a prodigious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于现代性终结时期的思想和存在之“微弱”的观点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论,1983年他出版了与P. A. 罗瓦蒂合编的论文集《微弱的思想》,在意大利哲学家和理论家中激发了具有火药味的公开争论。^③ 除瓦蒂莫的学术努力外,他每周还给意大利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新闻邮报》撰稿,1986年他与其他哲学家主持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电视辩论。在最近几年里,对“微弱思想”难题的国际兴趣呈指数般的增长。由此,瓦蒂莫应邀到包括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学任教,并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和南北美洲进行讲演。他有两本书被译成法文,但是在英语世界中本书则是第一次出现^④。

我们必须把《现代性的终结》放在它所属的欧洲虚无主义传统的背景之中。然而,这种传统在意大利并没有特别深的根基,而且读者会注意到,瓦蒂莫几乎没有涉及过去或当前的其他意大利哲学家的著作。在此,对意大利近来的哲学史做些简单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考察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瓦蒂莫这样做的理由。虽然几乎没有意识到战后法国和德国的哲学发展,但是,在法西斯统治倒台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里,在意大利工作的许多哲学家所选择的研究或者在马克思/葛兰西传统内,或者至少在存在论和现象学传统的范畴中。由于遭受了非理性主义和专制主义幽灵的折磨,一般来说,战后的意大利哲学和世俗理性是通过把伟大价值寄托于理性力量和理性主义思想中做出反

^③ See, for instance, the rubric “Debole/forte” which appeared in *Alfabeta* in 1984 and 1985 (nos 60–70).

^④ The author has made of minor revision to the Original Italian text on the occasion of its publication in English. The only truly major alteration, however, is a revised concluding section to chapter 10.

应的。^⑤ 新的理性和现存社会体制——以及新的辩护，必须由战后的意大利哲学和社会理论去寻找新意大利文化的支柱。毫无疑问，对理性的这种突出强调最终促成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意大利的爆炸性发展，与战后意大利的其他任何文化产品相比，这两者都非常成功地被输送到了其他国家，并且遥遥领先于“微弱思想”。然而，随着 60 年代后期法国具有深刻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意大利文化吸收了后结构主义思想之后，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赋予理性的中心作用，以及在真理探索中所运用的理性化程序也开始被取代了。在意大利，拉康、福柯、巴特、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所有这些人

xi 都曾受过尼采，至少受过海德格尔的影响^⑥）的革新思想，引起了关于当代思想的新基础和新真理的争论——或者根据马克思所激发的历史主义，或者根据普泛化的和非历史的结构主义——为整个意大利 70 年代对理性和真理这些观念的质疑过程开辟了道路。^⑦ 此时，长期从事尼采和海德格尔研究的瓦蒂莫作为一个关键人物，开始出现在意大利哲学的发展中。当这十年结束之时，哲学的危机导致了危机的哲学。而且，这部文集集中的论文

^⑤ Cf. Pier Aldo Rovatti Vattimo and Gianni Vattimo, "Premessa", in *Il pensiero debole*, ed G. Vattima and P. A. Rovatti (Milan: Feltrinelli, 1983), p. 8.

^⑥ Thomas McCarthy note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abermas'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vii, that "for French post-structuralism... it is above all Nietzsche and Heidegger who furnish the inspiration and set the agenda."

^⑦ Habermas's work vigorously defends the value of modernity and rationality, and thus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Vattima's (Which rejects outright any such defence); it is chiefly for this reason that Habermas is barely mentioned in the *The End of Modernity*. Cf. Martin Jay, in an unpublished paper on "Habermas and postmodernism", who notes that no one involved in the debate over post-modernism "... has been as forthright and unflinching a defender of the still uncompleted project of modernity as Jürgen Habermas".

(最早的写于 1979 年),见证了 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新哲学所导致的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地说,这就是瓦蒂莫论述“微弱思想”的著作的语境,而且他本人也提到过,这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不可分割的语境。^⑧

至少在当代意大利的文化语境中,瓦蒂莫后现代性哲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他坚决主张严肃地对待哲学虚无主义。“欧洲虚无主义”这个词语来自尼采《权力意志》的第一卷,其标题所用的就是这个词语,而且开篇写道:“虚无主义正站在门口: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客人从何而来?”^⑨尼采宣称的“虚无主义正站在门口”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欧洲来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它变成了“最不可思议的客人”?这正是《现代性的终结》的中心问题,而且,只有认真阅读了这部书在不同阶段表达的观点之后,我们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欧洲虚无主义主要涉及的是真理被分解和消解而变成了价值,它采取了人类信仰和意见的形式,或者如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的形式。^⑩简单地说,这意味着虚无主义哲学的目标就是要剖析和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所有真理主张,只有当它达到这一点时,这个过程才会结束,即揭示出这些假想的“真理”——xii
诸如上帝或灵魂——与人类其他任何信仰或意见一样,不过是各种主观价值和“谬见”。尼采在用虚无主义的方式分析这一点时写道,形而上学看起来像“科学……它解决的是人类的基本谬见——

⑧ Gianni Vattimo, “Le deboli certezze”, *Alfabeta* 67 (Dec. 1984), p. 8.

⑨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8), p. 7.

⑩ Maurizio Ferraris, *Tracce: nichilismo, moderno, postmoderno* (Milan: Multhopla, 1983), p. 5.

但它们却似乎成为了根本真理”。^⑪ 虚无主义思想致力于表明，形而上学的“真理”只是表达给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主观价值，而不是上帝、人类或自然世界的永恒的、不变的本质。因此，虚无主义攻击它在所有地方碰到的理性，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艺术中的理性，因为“理性”和“真理”的概念完全依赖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虚无主义的筹划旨在揭开作为信仰系统的理性体系的面纱，并证明逻辑——这是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不过是一种修辞而已。所有那些声称要发现真理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权力意志——甚至是统治意志——的表达，那些制造这些真理主张的人对接受这些主张的人的统治的表达。欧洲虚无主义思想尤其认为，无利害的、科学的、完全理性的、绝对客观的、中立的真理探索，是西方思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觉。在虚无主义的视野中，尼采指出，谬误与真理之间的区分始终是一种不可靠的区分，而且废除了谬误也就等于废除了真理。^⑫

欧洲虚无主义理论与人们现在所指的“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哲学的奠基者就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差异哲学宣称，必须消解真理与谬误、本质与现象、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所有区别，根本不存在没有差异的终极保证和不可动摇的根基(例如为了以一种严格的客观化方式制造这

^⑪ Friedrich Nietzsche, *Human All Too Human: A Book for Free Spirit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6), p. 22 (translation slightly altered).

^⑫ Nietzsche, *Twilight of Idols*, trans.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 41: "We have abolished the real world; what world is left? Perhaps the apparent world?... But no! *With the real world we also abolished the apparent world!*"